

陶渊明和他的诗

李伯齐

陶渊明是我国中古时代的伟大诗人。他的诗作虽然仅有一百二十余首，但却影响深远，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对于这样一位伟大诗人，自唐以后评论者代不乏人。因时代不同，美学趣味不同，评论自然是毁誉纷纭，五花八门。解放后，学术界关于陶渊明的一番讨论，广泛涉及到诗人的生平、思想和创作，取得可喜成果。我做为一个喜欢陶诗的读者，读陶之余，也偶或有一些粗浅的想法。这些零碎想法，涉及到诗人的生平思想和创作。因自己学识浅薄，这些想法也很难出前人之外，只是作为读陶笔记、感想，写出来以就正于专家和读者。

一

陶渊明，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他生于东晋兴宁三年（公元三六五年），卒于宋元嘉四年（公元四二七年），正当晋宋易代之际。而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东晋度过的。

诗人一生大体经历了读书、出仕和归隐三个阶段。而归隐，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的诗作大部分写于归隐之后。他“躬耕自资”的生活，及吟咏这段生活、感受的诗章，即后人称之为“田园诗”的部分，使其在诗歌创作上获得了独特成就。

二

陶渊明究竟是怎样一位诗人？他的思想有些什么特点？历来解释是不同的。自从梁的钟嵘称其为“隐逸诗人”之后，陶渊明便成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隐”（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并被描绘成一个冲宁淡泊、悠闲飘逸的形象。而历代仿陶学陶者，又大都在政治上不得志，只慕其高情逸致，于是陶渊明便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飘飘然，以致模糊了诗人的本来面目。早在宋代，朱熹等人就曾指出陶渊明归隐是“带气负性”“欲有为而不能”（《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实际上，你如果细玩陶集中被视为词气“和平”的诗文，就会感受到诗人那种壮志不得施展的天矫不平之气。即如常被人称为诗人自叙传的《五柳先生传》，乍读，文章的气韵确乎悠闲淡远，“五柳先生”也仿佛是个“忘怀得失”的隐士。然而，文章末尾却意味深长地自问道：“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他宁愿做远古时代的人，却不愿做当代的臣民，其愤慨之深可以概见。他于司马晋、刘宋都是深恶痛绝的，他既不是东晋的“逸民”，也非刘宋的“隐士”。钟嵘称其为“隐逸”，把诗人仅仅看

作晋室“忠臣”，实在是把诗人贬低了。如果再读一读《感士不遇赋》那篇如烈焰喷发、言辞激烈的文章，和寄寓着深沉悲愤的《读山海经》等“金刚怒目”的诗作，你就会感到，这位以“冲淡”著称的诗人，并非只是冲淡，他实在十分执着。“冲淡”只是其外部表现，而“执着”才是他的本色。正由于其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所以他才能卓立于玄雾弥漫的东晋文坛，在极其黑暗的时代成就为一代诗人。

三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极其黑暗的。统治阶级纵欲奢侈，“一宴之饌，费过十金；丽服之美，不可殚算。盛狗马之饰，营郑、卫之音，”以至“凡庸竞驰，傲诞成俗”（《晋书·范宁传》），社会风气极其败坏。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世族豪强大量侵吞、兼并农民土地，以至“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夺”，甚至“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宋书·武帝纪》），赋役之苦，逼得农民“至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晋书·范宁传》），从而使阶级矛盾不断深化，终于激起了以孙恩、卢循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农民的反抗虽然被镇压下去，而统治阶级内部，自晋安帝隆安元年始，至东晋灭亡止二十三年间，变乱迭起，篡弑相继，以至演成刘裕篡晋自立。这期间，正是渊明出仕到归隐的时期。

处于晋末的陶渊明，曾经追慕孔子处于衰世而汲汲于“弥缝使其淳”的精神（见《饮酒》第二十首），怀有匡时济世的大志，如其《杂诗》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为此，他在二十九岁时踏上了仕途。但是，黑暗的时代在他面前却设置了重重障碍。第一是门第。他本为“晋世宰辅”陶侃之后，祖父、父亲又都做过太守一类官职，按说门第不成问题。但是，陶侃当时的政治地位虽可与世族相抗，但却因其出身卑微，而不为世族所齿，陵迟至于渊明，家庭既已破落，其身分当然就与庶族无异了。当时世族凭借“九品中正制”把持仕途，形成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世）族”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世族子弟二十岁即可仕为著作佐郎、散骑侍郎一类高官，而庶族子弟三十岁才可试作州县小吏。所以渊明也只能仕为州佐和县令一类小官。这与他强烈的功业抱负就形成尖锐矛盾。这种矛盾，就导致诗人与当权的世族之间，在政治上产生离异倾向。有人说，他想往上爬，爬不上去，所以不满。一个封建文人，在仕进中掺杂一点功名利禄思想，本不足怪。渊明当然也未能免俗，如其《命子》诗中就有所表露，但其为国建功立业的抱负还是主要的。屈原想取得楚怀王的信任，李白直谒玄宗，杜甫的“致君尧舜上”，无一不是想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渊明何独不然？这是历史给予他们的局限。第二是仕途黑暗。这一点，诗人感慨甚深，如其《感士不遇赋》云：

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志正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已清操之人，或没世而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

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

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

整个社会上充满了虚伪。以儒学维持其宝座的皇帝，如晋孝武帝，“崇信浮屠”，以求来世之福；野心家，如桓玄，标榜玄学，以迷惑当世之人；机诈奸巧、寡廉鲜耻之徒，奔走钻营、趋炎附势之辈，驰骤官场之中，而品德高洁、“怀志正道”之士，或隐而不仕，或没为下吏，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总发抱孤介”“志意多所耻”的陶渊明，在这恶浊的现实中，自然是“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格格不入。他既不能追腥逐臭，做桓玄、刘裕之流争权夺利的工具，又不能转而走向劳动人民的行列；既不肯适，又不能抗，就只有退而洁身自好，“独祇修以自勤”，走归隐田园的道路了。

四

对陶渊明的归隐，一向争议较多。一谓其“耻事二姓”，一责其逃避现实。前一说法，最早见于沈约的《宋书·隐逸传》。沈云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其根据是“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此后附和者甚多，著名的就有写《南史》的李延寿，注《文选》的李善，宋代的朱熹、晁公武等。自宋僧思悦对“唯云甲子”提出异议之后，至近人梁启超、朱自清等皆有驳辩，基本上被否定了。而近来又有论者提出陶渊明的“忠君思想”问题，仍然认为他忠于晋室而反对刘裕篡晋是其归隐的主要原因。根据就是诗人的家庭、封建教养，及其作品中被认作是批判刘裕、悼怀晋亡的诗作。但这两点根据并不够充分：

其一，家庭并不能决定其政治倾向。陶渊明固然为“晋世宰辅”之后，对于“祖德”，他也确乎曾以为光荣，这见于他早年写的《命子》诗。而与他同时而稍晚的谢灵运，其祖上是东晋大世族，而他也袭封为安乐公，照理象他这样的人，不是更应该忠于晋室吗？然而他却归顺了刘宋，并且仍然居于显要。再如陶渊明的友人颜延之，也是官僚世家出身，而他也入宋做了高官。那么，是不是他所受的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封建教育，使他尽节晋室呢？那也不见得。陶渊明确乎有很深的封建教养，如其自云“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诗书敦宿好”（《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表示要“师圣人之遗书”（《感士不遇赋》）。但是，儒家思想并不纯一，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内容，因之同是受儒家思想教育，因其个人经历、品格的不同，接受的影响也就大不相同。陶渊明嫉恶丑恶现实，品格狷介，因“志意多所耻”（《饮酒》），而“有所不为”（《论语·子路》）。他的归隐，只是欲有作为而不能，只好“有所不为”，即不与丑恶官场同流合污而已。这与忠不忠于晋室并不相干。

其二，渊明归隐，时在东晋，下距刘裕篡晋尚有十五年之久，他岂能未卜先知？其时刘裕刚刚击败桓玄，使晋安帝复位，正可以尽忠晋室，作一番事业，为什么反倒退隐林下表示“终死归田里”（《饮酒》）呢？刘裕未篡，固然谈不上“不满”；刘裕篡晋之后，渊明对其批评（如《述酒》），也不过是对其篡弑行为的憎恶而已。即如论者经常称引的《拟古》第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诚然为刘裕篡晋后的讽喻时事之作，而“柯叶自摧折”“本不植高原”，岂不明明是说东晋皇帝不自励自强，终被篡夺是咎由自取吗？这很难说成是凭吊亡晋之作。

他自述其归隐原因的诗，如《饮酒》第十九首云：“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已。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他明明说“志意多所耻”，不肯与恶浊的官场同流合污。所谓“介然分”，也决不是对归隐十五年后刘裕代晋而言，是十分明显的。至于说“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与鲍照、李白愤极而呼的“行路难”，其意正同。诗人有着仕而隐、隐而仕的几番经历，身感目睹东晋官场的黑暗和丑恶，对当权的统治者的幻想已经破灭，深感政治上已无所可为，于是决然归隐。他的归隐，既不是沽名邀誉，也不是走“终南捷径”，这已由他归隐后于穷愁潦倒中几次拒绝出仕所证明。诗人正是怀着壮志不获聘的悲苦和屈原那种“已矣”之哀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至于对诗人以“逃避现实”相责，那更是加在诗人身上的无妄之罪了。因为在那样的黑暗时代，象陶渊明这样的封建文人，对于黑暗的政治现实，也只有不与之合作这种斗争手段了。诗人归隐，正是他执着于自己理想的表现。这从他归隐后反复抒写“有志不获骋”的郁愤心情，即可证明。

当然，归隐毕竟是一种消极的斗争手段。而且在陶渊明也含有远身避害的意思，过高估价这种斗争方式也是不恰当的。

五

归隐虽是诗人政治生涯的结束，但却是他诗人生活的一个新开端。在“躬耕自资”的劳动生活中，诗人的思想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使他逐步缩短着与劳动人民的距离，因而写出讴歌劳动和赞美田园的诗章，成就为东晋诗坛上独树一帜的伟大诗人。

诗人归隐后的诗作，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咏怀诗，抒写“有志不获骋”的愤激之情；一是田园诗，吟咏田园生活及讴歌劳动的自然质朴之作。这两类诗歌反映了诗人不向丑恶现实妥协的品格及其思想发展过程。

诗人虽然归隐，而心志未衰。每当想到有志不获，而中夜难眠，如《杂诗》第二首云：
白日沉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常悲凄，终晓不能静。

而且，此心至老不衰，如《杂诗》第五首云：

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
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谁能说这样的诗句，表现了诗人的闲情逸致呢？在平静的隐居生活中，诗人何尝一日忘其心志，又何尝有一日平静！每当忆及壮志难骋，岁月流逝，他悲凄，他愤激，他感到孤独和彷徨。“值欢无复娱”“终晓不能静”，感情是何等深沉热烈，非个中人岂能道得出！

至于早为人称作“金刚怒目”的作品，如《读山海经》、《咏荆轲》等，都寄寓着诗人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与此类诗歌可以并读的，是《感士不遇赋》。这篇赋委曲婉转地叙写了自己的心志、遭际，感情的真挚强烈，“徒握兰而谁亮”的呼喊，千古之下仍能打动读者的心。

当然，诗人只把“有志不获骋”的原因，归咎于仕途黑暗，而悲叹世无知己，看不到前途和出路，是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类诗，在今天也很难从感情上给人以激励，但诗人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却可使人们获得一定教益，并对诗人所处的时代有所认识。

诗人对理想执着的追求，与他对村居纯朴生活的热爱，是统一的。他在黑暗的官场无处立足，却在农村发现了他理想的“净土”。因此，他对村居和劳动生活的讴歌，正是对丑恶现实的否定和批判。在他抒写自己生活的艰辛和躬耕的甘苦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出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思想感情。

归隐之初，诗人心情是愉快的，他象鸟离牢笼，鱼归深渊，农村的一切都似初次发现，给人以清新、亲切之感。几株榆树，几株柳树，鸡鸣狗吠，缕缕炊烟，都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那么可亲可爱。因为这里“罕人事”“寡轮鞅”，远离恶浊的官场。在农事劳动中，“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彼此“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所关心的是农事的节令、丰歉，一切又都是那么纯真、朴实。这时的诗，以轻快的笔调，写出诗人顺遂欣快的心境。是不是象有的论者所说的，这就美化了凋敝的农村、掩盖了激烈的阶级矛盾呢？这是把诗人抬高了，他其实没有那样的大目的。他笔下的景物、人事，都是极其普通的。他所以渲染田园的淳朴、优美，无非要反衬官场的黑暗、丑恶，表现其对纯朴生活的热爱。这一时期的诗，的确也有闲适的一面。因为此时诗人家有“方田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园有“余滋”，圃有旧谷，虽较之豪门世族要贫寒些，但干活有僮仆，出门有舟车，生活仍可悠哉游哉。虽然也参加一点劳动，但因无饥寒之累，情绪也是轻松、欣快的，所以才会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但这样的生活很快就结束了。

诗人四十四岁之后，情况大变，两次火灾，宅宇焚如；连年虫旱，田中歉收，家境日渐穷困，诗人要“念饥乏”，虑温饱，不得不“躬耕自资”了。当然，所谓“躬耕”，也如诗人自己说的是“肆微勤”，参加一点轻微的劳动。即使如此，在那个时代，象陶渊明这样的人，也并非容易。樊迟问稼，被孔子斥为“小人”（《论语·子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被视为天经地义。在东晋末年士大夫以清淡脱俗、鄙弃世务为高尚的恶浊氛围中，诗人负耒荷锄，走到田间，确实是对传统观念和士大夫恶劣风气的挑战。事实上，他自己也是经过思想斗争的，即所谓“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他本来可以仕宦以求富贵，不必处穷守贱。但他为坚持志节，宁肯躬耕自苦，也不改变归隐初志，以至老死，这的确表现了诗人的志节和品格的高尚。

诗人躬耕自苦，本是为了励志守节，而在躬耕生活中，他不只获得了劳动的纯真意趣，而且思想感情也渐渐发生一些可喜的变化。如《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云：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风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

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诗人认识到劳动是衣食之源，对不劳而获表示了反感。由自己“肆微勤”而早出晚归，饱受风露之苦，而体会到“田家”劳动的艰辛。这种对劳动的朴素的认识，及对劳动的真切感受，使他与农民的感情逐渐接近起来。他们之间不只有“共道桑麻”的共同语言，而且建立了“闲暇辄相思”的真挚情谊。因而他就对他们的遭遇有所同情，并通过自身的境遇，感受着那个时代给人民造成的苦难。他去山泽野游，见到的是“荒墟”、“丘垅”，对“死无复余”的惨景，徘徊不忍离去；他离开上京旧居六年，“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使诗人“惆怅多所悲”。虽然诗人回避了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但这些感触，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反映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史载，江州地区“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农村“民疲田荒，杼轴空匮”“事役繁苦，童耄夺养”（《宋书·武帝纪》），致使“贫者不复堪命”（《宋书·荆州蛮传》），这都可以作为陶诗的注脚。

诗人晚年，羸弱多病，生活也更加艰苦。“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整日扶病躬耕，却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诗人不禁陷入深沉的悲苦之中了。他五十四岁写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慷慨悲歌，凄切地倾诉了他一生的坎坷遭遇：“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螣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幼年丧父，壮年丧妻，房屋被火，田中遭灾，以至于饥寒交迫。象陶渊明这样地位的人，遭遇尚且如此，一般穷苦农民的生活状况就更可以想见了。因而从陶诗可以间接看到农民在惨重的封建压迫剥削下痛苦挣扎的情景。

诗人晚年，艰苦备尝的生活境遇，以及躬耕自资的深切感受，使诗人对“趋时竞逐”“曳裾拱手”的“士女”越来越厌恶，对“宵兴”“野宿”的农夫农妇越来越同情，因而他就能较为清醒地看到现实社会的黑暗，较深刻地体会到人民的种种苦难。在对现实社会绝望的情况下，诗人不得不到幻想中去寻求他所向往的“真”“淳”的理想境界了。于是在诗人笔下便出现了一个没有王权、没有剥削、自耕自食，人人安居乐业的桃花源社会。因而，《桃花源诗并记》所描绘的社会图景，不是什么“世外仙境”，而是社会现实生活在诗人头脑中的折射，是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要求摆脱压迫剥削这一朴素愿望的曲折反映。有的学者指出，人民不堪酷虐、不断逃亡，以致“不避幽深”，是桃源理想的现实依据，这是很有见地的。而“四人帮”时代，硬把诗人说成“尊儒反法”，而把《桃花源诗》说成是“复古主义思想路线”的代表作，不过是为搞所谓“儒法斗争”，肆意歪曲作品的思想内容罢了。至于“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两句，已有研究者指出，是诗人针对统治者佞佛、士大夫专爱奇装异服而发。即使此论不确，只是只言片语，也无碍于诗的进步倾向。尽管桃花源理想，纯属虚构，是一种空想，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它与现实社会淳薄异源的社会图景，却能启示人们认识王权、赋税是其苦难的根源，因而就具有批判和否定现实社会的积极意义。当然，这种乌托邦社会，只能象夜空中的一道闪光，给沉沉黑夜中的人们一种梦幻似的希望和慰藉，却不可能引导人们冲破黑暗去寻求光明。这是时代的局限，而不应苛求于诗人的。

六

“文如其人”。陶渊明独特的生活道路，及其在恶浊政治现实面前独立不移的品格，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便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当时玄言诗风靡诗坛，内容上即刘勰所谓“诗必柱下（指老子）之旨归，赋乃漆园（指庄子）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语言上，即钟嵘所谓“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远离现实，以空谈脱俗为高，而缺乏文学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量。陶渊明敝履功名，远离恶浊的上层社会，以自己的诗篇吟咏淳朴的田园景物及躬耕生活中的真切感受，诗中不只充满着热爱生活的情愫，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而且表现出清新的格调，洋溢着诗情画意，就象亭亭玉立于污泥浊水之中的芙蓉，出之天然而净美。这使他不仅独步于东晋文坛，而且影响及于历代诗人，并使之成为我国田园诗派的开创者。

渊明“不矫然而祈誉”，也不矫情而为诗。无论吟诗自陶、赠酬友朋，还是吟咏怀抱、抒写感受，都是率性直寄，如从胸中泻出，因此不落前人窠臼，富有独创精神。至于为历代称誉的田园诗，更是融汇前代艺术传统，独辟新境。在艺术构思上，他不重一字一句的雕琢，而着重于创造一种美好的意境。有的用素朴的笔触，勾勒出参加劳动的生动情景，如《归园田居》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诗的意趣，画的笔触；既抒写了诗人初参加劳动时洒落欣悦的情怀，又画出诗人戴月荷锄、披草晚归的形象。有的则抓住生活中的一瞬间，而造成一种意境，如《饮酒》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幽静的景致，淡远的情趣，以及日夕鸟还所给人的哲理启示，水乳交融，达到了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在艺术手法上，诗人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极其普通的事物加以描绘，虽是晨风冷雪、鸡鸣狗吠，因渗透着诗人热爱生活的深挚感情，一经点染，也充满着生活情趣，富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至于“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鸟哢欢新节，冷风送余暑”、“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等为人击节称赏的名句，都是信笔拈出，不事雕琢，而又状物传神，意蕴深厚。陶诗的艺术成就，不只誉满东晋诗坛的颜（延之）、谢（灵运）不能望其项背，就是唐代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田园诗人，也只学得其某些方面的技巧，而难得其诗中的真趣。

七

陶渊明在他的时代，思想和创作都是独树一帜的。思想方面，在封建士大夫空谈、纵欲的恶浊氛围中，他“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坚持不与当权者合作，“贞志不休”（肖统：《陶渊明集序》）；创作方面，他冲破了玄言诗、山水诗对文坛的统治，以清新自然、内容充实之作，卓然独步，为我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自唐代大诗人李白、宋代大词人辛弃疾，至清代诗人龚自珍、黄遵宪，都学习陶渊明不慕荣利、不与污浊现实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而艺术上，从六朝到清末，凡有成就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等，几乎无一不曾受过陶诗的熏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至于有人在思想上接受陶诗中某些消极影响，自有其本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及个人思想品格等原因，是不能概由陶渊明负责的。